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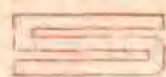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

乙 冊

N

冊

用編序



見片
意夢
提煉
靖段

北京师范大学文溯阁

1956—1957 学年度第二学期

文学史第十七讲

B. B. 柯尔尊

中. M.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道路

(1821—1881年)

菲陀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卓越的代表者之一。同时，他可能是世界文学中最复杂和最矛盾的一个作家。在整整几十年里，他的创作曾经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这种讨论在今天还在进行着，因为与他的世界观与创作有关的一切能够引起争论的问题还远没有获得圆满的解答。

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片面地评价他的创作遗产是不容许的。在对他进行评价时，我们必须遵循着别林斯基的传统，他正确地观察到年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艺作品的进步方面，同时他又以指责的态度评定了他的主观主义的反动倾向。杜勃罗留波夫和皮沙烈夫也是沿着同样的途径去分析他们能够读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作品的。

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开展着解放运动的时期里，高尔基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最正确的评价。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他描写了农奴主的兽行，他说：「应该有这样的人出现了：他在灵魂深处体现着人民对一切苦难的追忆，而且把这可怕的追忆反映出来——这个人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译文见缪灵珠译「俄国文学史」，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433页）。高尔基也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天才，只有莎士比亚的天才才能和他相比。同时他也始终一贯地揭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观点，他的作品在反动势力和革命运动进行时曾被反动势力广泛利用过。列宁支持了高尔基的这些论点。至于列宁本人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则可以用他的个别的评论意思以及他同时代人，例如B. 蓬契-勃鲁耶维契的回忆录等来加以说明。

以說明，他說「符拉季米爾·伊里奇曾經無情地譴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中的反映傾向……同時，符拉季米爾·伊里奇曾經不止一次地說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是一個天才的作家，他看清楚了當時社會生活的不健康的各个方面，在他的作品里是有許多矛盾，許多不正常的現象的，但是同時——也有着一幅「描寫現實的活生々的圖景。」

要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和創作中的矛盾根源，與其從他的傳說特點（刑罰的威脅，苦役，他所患的精神病——羊癲瘋）中去找，還不如從俄羅斯社會生活以及他的社會思想的獨特性中去找。

在舊俄國，如同在另一些國家一樣，這樣的社會階層如小市民階層佔有過顯著的地位。他們的意識形態在很多方面是和小資產階級羣眾相接近的，他們的特点是極度的社會動搖性，這種動搖性在資本主義關係帶着它的一切矛盾發展起來的時期里表現得尤為強烈。小市民一方面受到了新事物秩序的壓迫，另一方面，卻又沒有堅決表示抗敵並為改善自己社會地位而進行鬥爭的力量。

在這一羣人中間有不少平民知識分子和正直的勞動者，他們獲得了拋棄自己社會的狹隘觀點，並走上革命鬥爭道路的力量，在這些人面前展開了積極獻身為人民服務的可能性。這就是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以及那些來自貴族社會的，擁護他們的先進人物（涅克拉索夫，薩爾蒂柯夫—謝德林等）的道路。

小市民，平民知識分子中間軟弱的人與意志不強的人就不利於社會生活的敵對條件妥協起來了，把自己禁閉在毫無根據的幻想，痛苦和犧牲自己的境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這部長篇小說里所描寫的瑪卡爾·傑澤武庚及瓦爾瓦拉·陀勃

罗萨娅娅的形象中，以及「罪与罰」这部长篇小说里索尼亚·玛尔美拉陀娃的形象中指出了这一类人的生活道路。

同时这帮人里的一些不愿意妥协和驯服的人则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无政府状态的反抗中，为了争取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不惜运用任何手段，甚至走到了犯罪的地步。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幻像」里的高良德庚，长篇小说「罪与罰」里的拉思科里涅科夫等人。这些人由于处于绝望的控制之下，以致在力求致富，力求取得社会地位和功名富贵时表现出了极度的残忍和无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许多作品里首先指出了这种小市民、平民知识分子人羣的情绪和感受。小市民、平民知识分子阶层是在世界各国都有的。组成这一阶层的人实际上有着小资产阶级的的情绪。他们必须为使自己能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条件之下生存下去而进行紧张的斗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他们是不会有一定的稳固地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首先从这帮人身上找到了他的得意手法，因为这些长篇小说直接表现了他们的绝望和感受。

如果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把人民的命运作为他们创作和注意的中心，同时他们力争的乃是指示人民的历史作用及其摆脱剥削的斗争道路，那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被提到首要地位的却是为内在矛盾所折磨着的个人。如果另一些俄罗斯文学的古典作家力求在自己的作品里愈益广泛地包括社会生活现象的各个不同方面，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注意却首先是指向艺术地进入个别人精神生活的深处去。

他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对那些与劳动人民没有紧密联系的人的心理分析的匠师。对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个别图景，特点和某些方面的艺术描写的深刻的真实性是与破坏生活真理结

合着的。出现了一些畸形，病态和带着被损害的心理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了作者想用艺术形象来说明自己错误观点的意愿。

虽然如此，应当指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客观实质，经常是能够战胜作者的思想局限性的，而生活的真理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的反动方面相抵触的。

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世界观的非凡的矛盾性。他于1854年写道：「我告诉您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我是时代人，是不信任和怀疑的人，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到棺材盖上的时候都是这样。这种要相信的渴望，在过去和现在，对我来说，是需要付出多么可怕的痛苦啊，这种渴望当我拥有更多的对立论据的时候，就会在我的心灵上显得更加强烈」。

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他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俄罗斯整个先进的和进步事物的猛烈的敌人，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们的不调和的对头。在我们的时代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还广泛地利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和创作。德国的反动哲学家尼兹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鼓舞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布成为自己的「伟大导师」。整个的外国反动势力，美帝国主义的宣传者，种族主义，颓废主义，以及各色各样的神秘主义都竭力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为自己的卑劣活动，贩卖行为，挑拨离间，为向人类进攻和在歼灭战中去毁灭人类找寻辩护。

在目前激烈思想斗争的条件下特别重要的是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遗产进行客观的分析，而不要有任何的为他的反动观点作辩护的企图，同时要对那些想在这种借口下去抹煞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和具有人道主义理想的作家的成就的人不作任何的退让。

我们不能不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和理智乃是一

个斗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在宗教和无神论间，在对痛苦的颂扬和不接受痛苦之间，在顺从和反抗之间，在害怕革命和对社会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兴趣之间，在认为罪恶、黑白颠倒和苦难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的思想和同时希望在焕然一新的、幸福的尘世上有着优秀的、合谐的人的幻想之间；都互相展开了冲突（A.A. 别尔金。菲陀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知识》，1956年，第12页）。

※ ※ ※

菲陀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莫斯科贫民医院的一个医生的家庭里。他的童年是在半贫困状况下度过的。笼罩着这个家庭的是宗法主义的小市民情绪，但同时在这个家庭里培育着对书本和智力劳动的尊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被送入私立的寄宿学校学习，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他从1837年起就在军事工程学校继续学习（见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页）。在这几年里他在阅读和尝试写作戏剧作品上进行了很多的工作。

在工程学校毕业之后他在工程局里服务一年然后就辞职了。他迁居到彼得堡，住在郊区的一个小而穷的屋子里。那些在这几年里认识他的人指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好功名的意向，他的孤僻和故步自封。他加紧地写作文学作品，照旧地读很多的书。曾经在一个时期里和他一起住过的作家格利戈洛维奇在自己的诗篇《文学回忆录》中说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得是很多的。当他停止写作的时候，那末，在他的手中就立刻又会出现一本书。他很醉心于普希金，果戈理和巴尔扎克；他阅读了哥德、席勒、乔治·桑、雨果和霍夫曼等人的作品。

1845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创作，即长篇小说《穷人》。由于格利戈洛维奇的提议他把手稿送给了涅克拉索夫，涅克拉

索夫开始了对它的审阅并立刻对它发生了兴趣。他和格利戈里·维奇一起通宵达旦地阅读这部小说，他们大为兴奋并立刻去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祝贺他创作了一部天才的著作。他们是早晨四点钟到他那里去的，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然后就开始了很激动而兴奋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逝世不久之前，用人类的极其深刻的热情和激动，回忆了关于这次的会晤和关于他的天才的第一次被承认。

涅克拉索夫把这部长篇小说的手稿转送给了别林斯基，别林斯基的批评文章，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来是如雷贯耳的，同时在那些年代里他对别林斯基也是有着深厚的敬意的。[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当涅克拉索夫拿着长篇小说《穷人》的手稿走到别林斯基的居处时喊道：[你们的果戈理简直是如雨后春笋那样的多]——别林斯基严肃地指出说，但是手稿是收下来了。当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说，涅克拉索夫到别林斯基那里去的时候，别林斯基[极度激动地]接待了他：[起来，快些把他引来见我！]。

别林斯基用这样的话欢迎了这位青年作家：[而您自己是能理解的……您所写作的是怎样的一部作品！]。

别林斯基立刻就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作品和俄罗斯文学的果戈理派系的坚强联系，他在自己的批评论文里曾非常热烈地捍卫了这一个派系。没有疑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长篇小说《穷人》的时期里这位伟大批评家的批评文章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作品里的主要的主人公——非常顺从的和备受虐待的玛卡尔·杰泽武庚是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中的阿卡契·阿卡契也维奇·巴沙钦金的血亲兄弟，但是在他们当中也有诸一些区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它是继续，而且也发展了在大都市（在这里贫富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的社

会生活条件下受压制的「小」人物的主题。

瑪卡尔·傑涅式庚是一个小官吏，他爱上了过去的莊园管理人的女兒瓦蓮卡·希罗陀勃洛兰拉娃。傑涅式庚因自己的贫穷，遭受压制和生活上的没有前途而非常痛苦。但是他善于筹思。由于对自己的生活的恐惧和因自己的无权地位而痛苦，就使得他很伤脑筋。但是在对他的描写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並沒有重复果戈理的手法。果戈理小说中的官吏阿卡契·阿卡契也维奇是可怜和可笑的。他的整个生活兴趣都集中在外套上。在傑涅式庚身上产生了一种人类尊严的思想。他很谦虚，他忘我地爱上了瓦蓮卡，他阅读书籍而且也理解一些事物。例如，他对果戈理的「外套」非常气愤。他竭力想把自己保持在相当高的地位上。他甚至也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为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他在给瓦蓮卡的信中说：「那么多的馬車川流不息；馬路怎么会承得起这么些馬車的！那么漂亮的馬車；窗玻璃亮得跟镜子一样，里面挂着絲绒和绸子；贵族的听差佩着肩章，身上带着劍。我们所有的馬車里看一眼，里面都坐着盛装的女人；大概是些公爵小姐和伯爵夫人吧……那时我想起了您。唉，我心爱的人，我的亲人！……瓦蓮卡，您为什么这么倒霉呢？我的小天使！您哪一美不如他们呢？您又善良；又漂亮，又有学问；为什么有这么坏的命运落在您身上呢？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好人倒孤老伶仃，可是对另外一个人，幸运却自己跑上去。」（作家出版社，译文140—141页）。

瓦蓮卡也要像傑涅式庚一样对生活具有着同样的了解。她在生活中是遭遇了许多的不幸——她宝贝柯夫曾沾悔和欺侮过她。傑涅式庚在精神上很同情她，而她也倾向于他，但是她了解要是让两个贫穷的和不幸的人兒结合在一起则是很困难的。她嫁给了一个经常欺负自己的人——她宝贝柯夫，虽然她是很明白：

同他在一起生活是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快乐的。

瓦蓮卡的这一举动对于馬卡尔·傑涅式庚来说，乃是一个沉痛的打击，他辗转不安，心情烦恼，但是到最后他还是在双重的矛盾状态中了。一方面他虽使自己相信听天由命的必受性，因为他深信「任何情况都是由神来决定的」。同时他也感觉到生活中的不正义事实压制了自己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尊严，所以他感叹地说道：「凭什么理由来这么办呢？」但不能期待傑涅式庚会采取任何的行动和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幸福和未来。这是跪着的反抗。

「小」人物的悲惨地位，他们的无保障和无权利，经常的卑屈和贫困——这就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作品的基本内容。别林斯基马上感觉到了小说的民主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方向。他写道：「荣誉和光荣应归于这位青年的诗人，他的天才就是喜爱那些住在 楼和地窖里的人们」。他又继续写道：「许多人都可能以为作者是在傑涅式庚的身上描写一个被生活把智慧与才能压抑和压息住了的人。如果这样的来想，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作者的思想是更深刻和更人道得多；他通过馬卡尔·阿历克塞叶维奇向我们证明：在极狭小的人的性格中是有着许多优美的，崇高的和神圣的东西的」。

除了受到社会上恶事所压制的正直而善良的人们之外，作者在小説的篇幅上还描画出了那些作出这种恶事的人们。

由于想来洞察主人公们精神体验的深处，就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书信体的形式。傑涅式庚和瓦蓮卡在他们所交换的那些信件中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和心情。这些信中的语言是无常规的，在其中既可碰到有抒情的独白，也可碰到有表现极端的心情激动和在一个绝望人的歇斯的里喊叫声中所外溢的精神痛苦的字句。

作品的结构是服从于对各主要主人公们的命运的揭露。小说是从一幅夏天的田野耕种的图景开始的。那时「一切思想总是如此地愉快、明智、奇妙，因此滋生的梦想也就进入到心里来了：一切都涂上玫瑰的色彩」（作家出版社：《穷人》，第3页）。

随着冷酷无情的现实压抑了保渥式庚的一切为人所具有的情感及其朴实的理想，他的写信文体也改变了；「唉，天呐，天呐！那么您真的要跟贝柯夫先生上草原去了，而且一走就永远不回来了！唉，宝贝儿！」作家出版社：《穷人》，第143页）。

在小说的末尾发出一个在生活中没有留下任何光明的正在毁灭着的人的可怕的呼声。在保渥式庚的心中产生的一切优秀的东西，对于任何人都是不需要的，都不接受它，都被打碎了。「是啊，不行，怎么能这样呢？凭什么理由要这么办呢？」——他在最后一封信中以完全绝望的心情感叹着说。

但是他没有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一个人反抗而又安顺——这就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基本课题。在《卡拉玛卓夫兄弟》小说中，这一课题将在两个兄弟（反抗分子伊凡和安顺的阿略沙）的形象上被以特大的力量提示来了。

我们有权作出结论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中就已表现出了那些在将来曾把他引导离开俄国进步文学大道的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达到别林斯基的革命观点，他依然是唯心主义观点的俘虏。在他的创作中开始加强了对人的命运的悲观的观点，他把人看作是一种永远包括着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容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一部作品是中篇小说《幻像》（1846年）。在这部作品中他继续发展了《小》人物生活的主题。一

个不著名的小官吏高略德金也像馬卡尔·保達式庚一样，是力图保持人的尊严，成为生活中知名之士，取得爱情和社会上的尊重。他是比保達式庚更为自爱的人，但是如果說保達式庚在自己对瓦蓮卡的爱情中是有着某种道德上的支持，那么这种支持在高略德金那里却没有。想巩固自己的生活地位，想出人头地的这种願望就使他产生了一些痛苦的幻想：他希望能在生活中成为一个幸运的人。这些幻想的结果，就使高略德金突然开始看見了自己的幸运的幻像。他的意识分离成两部分——老高略德金经常地在自己面前看見自己的痛苦幻想的产物小高略德金。不仅如此，小高略德金还变成了老高略德金的刽子手和折磨者，並且终于使老高略德金发疯了，被送到疯人院中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想在这部中篇小说中采描写一个企图保持自己的尊严而且同时也不违背自己良心的小官吏，在他的这种願望中是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但是在把自己的构思加以具体化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则，並走上了心理分析的道路，而这乃是那些临床医生们的所早已从事过的了。但是作品的最大缺点是在于：作者在描写人的精神分歧时竟把这当成了自然的规律。他作出了結說說，恶不是敌視人民的社会现实的产物，而是人的性格中永恒的因素。反抗和安順，这两种因素的斗争，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肯定的那样，是人的精神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但是这种反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那里是采取了一些畸形的，幻想的形式。一个受卑視和被侮辱的人，犹如作家所肯定的那样，是可以变成侮辱者，而一个牺牲者也可以变成折磨者。所以这两种因素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同时具有的，它们乃是人的本体的一个不可割除的部分。

别林斯基以其巨大的敏感馬上指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新作

品中的对他的天才有着危险的一些倾向。他在指出在「幻像」中有着比在「穷人」中更大的创作才能和深刻的思想时，也指出了在阅读这一中篇小说时所产生的那些不明白的地方。

「作者用自己的口讲述主人公的经历。但却完全通过主人公的语言和理解……这一方面显出他才能中幽默的过剩，客观观照人生诸现象的无限强大的能力，将诸形迹到和他不相干的旁人的皮肤里去的能力；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小说里的许多情形变的模糊不明，例如：每个读者都充分有权不理解，猜不出老高略德金君会在神错乱的想象中虚构出瓦赫拉密耶夫和小高略德金君底通信，甚至小高略德金和他表面上的相似也是在不在他神情失常的想象中那样的大而惊人。并且一般地，关于高略德金的混乱本多，也不是每一个读者立刻就能猜得出来的。这一切都是缺欠，纵然这些缺欠是和整个作品的优美和美质连结在一起的。」（时代出版社：「别林斯基选集」，第219页）。

在批评家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警告，以及担心他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接受别林斯基的劝告和意见。在四十年代的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中，特别是在「女主人」这一中篇小说中，他的反动的和悲观的观点已是在还更大的程度上表现出来了。由于企图做做果戈理及其中篇小说「可怕之夜」，就使他走上了模仿和做作的道路。中篇小说「女主人」是有着假的人民性质，而且它证明了：脱离先进的思想就必然会引起作品的无说服力和平凡，以及艺术价值的削弱。

在以后的一些作品中——中篇小说「恐怖之夜」，短篇故事「微弱的心」，「普罗哈尔琴先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又重新回到了描写彼得堡污秽角落里的穷人，居住者，即在生活的

打击下奄奄待毙的和遭到极端绝望的「具有微弱的心」的人们的生活的主题。

别林斯基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一文中，以更其尖锐的笔调评论了「幻像」。他说道：「在《穷人》中由于初次试作而具有的一切尚可原谅的缺欠，在《幻像》中就成为了特大的缺欠了」。关于「女主人」这一中篇小说他写道：「是起来不由力地提高天才，因此就害怕走普通的道路，而是给自己找到一种不平常的道路。这是什么样的滥用天才或天才的贫乏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清楚：作者是想来试图调和马尔林斯基和高富曼，于此他就在这一最新的笔调中掺杂了一些幽默的因素，并用俄国人民性很浓地塗抹在这一切之上了。所以结果就成了一种极其特别的东西，这就不足为怪了」。

到五十年代末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优长和缺欠就是这样，当代先进批评家对他的态度就是这样。很难说，他的才能的日后的发展全沿着什么道路走去，如果不发生一些对其以后的整个生活和他的人生观起决定影响的事件的话。

尚在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成了彼得罗夫夫斯基小组的参加者，他是热中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了解到私人间的矛盾，但是他很快地就与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决裂了。因为他不同意别林斯基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不同意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

在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彼得罗夫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们被沙皇政府加以进行革命活动的罪名逮捕了。就中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状时是说他曾两次在小组的例会上宣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被革命小组的揭露文章所骇坏了的沙皇政府，甚至也就不想来分别每个参加者的罪状的轻重程度。虽然就思想方式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与先进的革命思想相

去很远的，但是他也同彼得罗夫分子们一起被判处了死刑。1849年12月22日，被判处死刑的人都被带到了彼得堡的谢敏诺夫刑场。其中的某些人被勒住了眼睛，所有的人都叫穿上了白色的殓衣，士兵们举起了枪，鼓声隆隆地响着，再有一分钟……也就要开始第一阵的排射了。正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忽然沙皇的一个侍从武官乘马急驰而至，宣佈取消死刑判决，代之以劳役。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其他的人们一起都尝受到了等待不可避免的死刑到来时的滋味。这些被判罪的人就直接从刑场被发配到了西伯利亚。沙皇已给他们带上了手铐脚镣。严重的精神病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受到的这些折磨的结果——他开始尝受到经常的羊痫风发作的痛苦。

沙皇政府所表演的这出带有枪杀和赦免的丑恶喜剧就是这样，其目的是要威吓革命集团，并摧毁那些想看来推翻现存制度的人们的反抗意志。

在奥姆斯特德监狱中过了四个年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被送去服了五年的兵役。只是在判决之后过了十年的光景才允许他返回特维尔，而后回到彼得堡，在那里他又从事文学活动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许多年过程中所遭受到的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折磨并非徒然地过去了。在他的世界观中间右转的过程加强了。他的宗教性加强了，他相信专制制度的不可动摇性，并最终他抛弃了对于革命改造社会的可能性的信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社会意识高涨的时期回到彼得堡的。克里米亚的战争事件，以及在农民改革前的先进的社会人士的觉醒，就引起了专制政府方面的一些相应的行动。对文学的压制加强了，先进的批评受到了迫害。

在这种环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劳役和流放的材料创作了一部新的作品——《死屋手记》（1860年）。在这部真实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里还没有充分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点中所发生的那些内心变动的结果。流刑犯即从人民中来的这些人们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入在作家的意识中了，他是很小心地把它转画在自己作品的篇幅上。

故事是通过一个讲故事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高良契科夫来讲述的。详细地描写了流放地区的生活和习惯，并勾画出了流刑犯和侮辱他们的暗探局人员们的形象。

《死屋手记》是以平板的叙述体裁写成的。作者是为了避免在评价所描写的各种现象和事件时的主观主义。由于想来真实地、现实主义地反映现实的这种愿望，结果就在这一作品中极其有力地表现了作者的人道的思想，他的对被侮辱者与被压迫者的深厚同情。

生活的真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发表的关于人性天生是恶的论点是相矛盾的。作者的信念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很难想像，人的本性可能弄得丑恶到什么地步。」在这一种情况下，罪恶是影响着人的性格的形成的社会条件。作者描写了罪犯格静来作为这种丑恶的性格的例子。他写道：「这个格静是可怕的人物。他给予大家一个可怕的、痛苦的印象。我老觉得再也不会比他要光狠和怪诞的了……我有时彷彿觉得我看到一隻巨大的，和人一样大的蜘蛛。」还讲到他「以前喜欢宰杀小孩，单为了快乐的缘故，把小孩引到一个适合的地方，起初嚇唬他，虐待他，在充分欣赏过可怜的、小小的牺牲物恐怖和战慄的情景以后，便静悄悄地，慢慢地，愉快地把他杀死。」（译文见耿济之译《死屋手记》，开明书店，第51页）

这一个可怕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人害者和专制魔王。但是

这一形象并不足以象征作者准备着手揭示的所有这些人的性格的。这里的绝大多数的罪犯恰正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反对专制政治关系，反对各种迫害，各种暴行。这一类人中间有曾经当过兵的，年老母亲的独生子西洛特金。军营生活和严格训练对他有着可怕的影响，他谈到士兵生活时说：「队长不爱我，老是惩罚我——但究竟为了什么呢？我顺从一切，谨言慎行地活着，不喝酒，不借钱，阿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一个人借人家的钱是最坏的事——四周全是狠心的，残忍的人——连哭都找不到地方。时常跑到什么地方角落里，就在那里痛苦一场。」西洛特金企图自杀，但是自杀未成。于是他决定杀死欺负他的人，队长，就在那时候，队长以一种惯常指责的口吻对士兵说了：「站岗是这样站的么？」——他用枪刺扎进了他的胸部。西洛特金穿过了行列，挨了四千下的棍打，被判了苦役的刑罚。（括弧内译文见上书，第50页）

在这群人里面有的是这一类的人。许多人跑到这里来，说是要逃避比任何苦役都可怕的生活条件。某些人来到这里，是「为了未婚妻、姊妹、女儿的贞节，杀死了一个好色的暴鬼」，在这里的少数人是备受压迫的被迫流浪的人。他们杀人是为了保护自己，便能逃避迫害者。作者说：「还有一种人故意犯罪，只是为了能够落进狱来，以躲避外面更加艰苦的生活。他在外面的生活到了最屈辱的阶段，永远吃不饱，从早到晚为主人工作着，而狱内的工作反而比家中轻松些，麪色也多些……」（译文见上书第55页）

由此可见，苦役生活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似乎比「自由」生活还好。这是作者作出的值得重视的结论。

他描写了被派来监督和看守囚徒的那些沙皇政权的代表人物。暴行者，迷信者和色情狂者的兇恶面貌表征了芮基白脱尼

阔夫中尉的为人。[他对他所管的两百个人来说，几乎是一个有着无限威权的长官。他自己只是一个下流而兇恶的人，此外再不能是别样的人。他把所有的犯人都当作是他天然的仇敌……他放肆，兇狠，有时甚至在晚上还锁进牢房里来，如果他发现有犯人向左侧卧或者仰卧时，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就要惩罚他并说：「我说，你应当按照我的命令向右侧卧」在牢房里，人人都恨他，怕他像恨和怕瘟疫一样。他的脸是紫红色的，一副兇相。

骑在人头上的无限权力使茂莱白脱尼阔夫变成了野兽。他以欣赏的心情来鞭打犯人，他细腻地嘲弄他们。他喜欢和罪犯稍稍交谈，然后伪装作一个心肠很软的人。甚至还宣称将要宽恕这个犯人。但是他做这一切却都是为了要使人更加痛苦地感受随之而来的兽性的刑罚。当犯人穿过行列遭受棍打的时候，茂莱白脱尼阔夫疯狂地叫喊着：「狠狠地抽他。剥去他的皮，烧灼他！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把这孤儿，重重地打，把这坏蛋重重地打！打呀！打呀！」小兵们挥鞭重重地抽下去，不幸的人眼睛里冒出火星，他起始呼喊，茂莱白脱尼阔夫跟在他后面跑着，哈哈地笑着，哈哈地笑着，笑得用手支住腰，几乎直不起来，弄得后来甚至看着他都可怜。他竟有那样的快乐，他觉得真是好笑。偶然他的响亮的，使壮的笑声中断了，重又听见他那套：「狠狠地抽他！剥去他的皮，弄死这孤儿，弄死这坏蛋……」
(译文引自上书第210页)

这样，政权代表人，蹂躏人权的茂莱白脱尼阔夫和嗜杀孩子的格静竟是同一流的人物。为他撑腰的是高高在上的，用上帝、沙皇和法律等名义来掩盖他的绝灭人性的罪行的人民受害者。

在描写类似的情景时，作者作出了更广泛的概括：「人性